

钱穆先生著作「新校本」

錢穆

政学私言

钱穆先生著作

〔新校本〕

政学私言

钱穆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政学私言 / 钱穆著. — 北京 : 九州出版社,
2016. 10
ISBN 978-7-5108-4756-1

I. ①政… II. ①钱… III. ①政论—中国—民国—文集 IV. ①D693.09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38245 号

政学私言

作 者 钱穆 著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责任编辑 周弘博
装帧设计 陆智昌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(100037)
发行电话 (010) 68992190/3/5/6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32 开
印 张 8.625
插页印张 0.25
字 数 170 千字
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4756-1
定 价 42.00 元

钱穆先生著作

〔新校本〕



钱穆先生

翠閣蒼山味
 奔雷萬斛
 飛泉湧出兼
 新極甘穠香
 幽處一川寒
 碧日紫回
 少隨流水道
 溪源行到源
 却惘然始悟
 真源行不到
 餅笋隨處
 弄潺湲
 生子渴題
 而才

錢穆


钱穆先生书法

新校本说明

钱穆先生著作简体新校本，经钱胡美琦女士授权出版，以钱宾四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所编《钱宾四先生全集》繁体版为本，进行重排新校，订正其中体例、格式、标号、文字等方面存在的疏误，内容保持《全集》版本原貌。

《政学私言》一九四五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。钱穆先生将刊于《东方杂志》的时政论文七篇拟为上卷，又将其发表于《思想时代》月刊的八篇文章编为下卷，定名“政学私言”。一九六七年，由台湾商务印书馆于台北再版。之后，钱穆先生曾作增修改订。一九九三年整编《全集》时，以钱穆先生修订者为底本，并增收钱穆先生三四十年代所写三篇文章，新添各篇，本书目录中加注“*”。

九州出版社

自序

客岁，胃痛时剧，经春历冬，每发愈厉。医嘱入院检验，谢事静摄。值寇氛嚣张，独山沦陷。后方惶扰，讹言日兴。床褥无聊，惟对报纸；或有朋徒相访，言思所涉，郁结百端。开岁小痊，颇能兴起，时尚仅饮汤液，一日七餐，每历两时，即复进食。一餐之前后，例作小憩。其间偶得数十分钟闲，握笔排闷，隔越旬日，亦成篇幅。春尽花落，病乃向已。检点成稿，凡获七章。其所论刊，皆涉时政，此为平生所疏，又不隶党籍，暗於实事。洛阳少年，见讥绦灌，老不知休，更可惭耻。抑时论所尚，必有典据，或尊英美，或师马列，蜾蠃之祝，惟曰肖我。其有回就国情，则以党义为限断，区区所论，三俱无当，溢曰“私言”，亦识其实。风林之下，难觅静枝，急湍所泻，无遇止水，率本所学，吐其胸臆，邦有君子，当不悯笑。蒙东方杂志社代为刊载，又承王

君云五允作单本印行，用广流传，私衷感激，未可名状。别有为《思想与时代》撰文数篇，此乃三年前旧作，附诸下卷，取相证发，要之为一家之私言云尔。

民国三十四年六月钱穆识

目 录

自 序 / 1

上卷

一、中国传统政治与五权宪法 / 1

二、选举与考试 / 18

三、论元首制度 / 34

四、地方自治 / 47

五、论首都 / 62

六、道统与治统 / 75

七、人治与法治 / 89

* 八、变更省区制度私议 / 105

下卷

- 一、中国传统政治与儒家思想 / 113
- 二、中国社会之剖视及其展望 / 135
- 三、农业国防刍议 / 156
- 四、战后新首都问题 / 168
- 五、中国传统教育精神与教育制度 / 187
- 六、中国人之法律观念 / 208
- 七、法治新论 / 231
- 八、政治家与政治风度 / 238
- * 九、中国之前途 / 250
- * 十、建国信望 / 258

上卷

一、中国传统政治与五权宪法

一

作者草为此文，先有一甚深之信念。窃谓政治乃社会人生事业之一支，断不能脱离全部社会人生而孤立，故任何一国之政治，必与其国家自己传统文化民族哲学相契合，始可达于深根宁极长治久安之境地。

民主政治为今日中国惟一所需，此毋烦论，盖惟有民主政治，既为世界潮流所归趋，抑亦中国传统政治最高理论与终极目标之所依向，故亦惟有民主政治，始可适应现势，符

合国情。

然民主政治仅一大题目，而非一死格式。英美同属民主，苏维埃亦同称民主，而英美之间复有不同，可见民主政治尽有种种异相。中国所要者，乃为一种自适国情之民主政治，重在精神，不重在格式。苟非中国人能摆脱模仿抄袭，有勇气，有聪明，能自创自造，自适国情，则或主步趋英、美，或主追随苏联，国内之政争，将以国外之政情为分野，并将随国外之势力为消长，国家政治基础将永远在外不在内，在人不在我，以此立国，何有宁日。

二

所谓民主政治之精神，莫要于能确切表达国民之公意。今试以此绳切当前之政论。有所谓团结与联合政权者，其意所指，则在各党各派间。若在英、美，多数民众无不隶属于政党，故多数党执政，即为代表国民多数之意见；诸党联合，即为代表民众全体之合作。中国则不然。党人之比数仅占国民全数一小部分，一党专政，固不得谓是多数之民意，即使全国各党各派联合团结，论其数量，依然占国民全数甚小之比率。政党代表不了民意，此乃中国目前政情一特有之症结。必由此着眼，仍始为对中国政治对症下药之途径。

中国人对政党兴味异常淡漠，此乃一不可掩饰之事实，此非中国人对政治无兴趣，惟其对政党政治则兴趣实嫌不足。

此不得以中国人民教育程度不足，政治智识不够为理由。当知政党政治实于国情未为适合。若求适合国情，则莫如创设一“公忠不党”的民主政治。此种政治，虽可有政党，而政党退居不占重要之地位。而今日国人之意见，则颇不如是。大率以为民主政治之运用，必有待于政党，而政党活动则群认英、美为楷模，此亦几乎成为国人之公论矣。

今姑不论英、美政党利弊之实际，当知英、美政党政治，亦自有其特殊之背景。此亦仅英、美为然，其他国家并不尽然。法国号称民主先进，彼与英仅隔一水，文化之相染涉者甚深且密，然法国常见为诸小党纷立，不能如英、美之为两大党对峙。其他欧洲诸大邦如德、如意、如俄，则政党成绩演化更浅。上次欧战以还，彼诸国王室倾覆，政局变动，皆各自有一种新政体出现，均不能步趋英、美之后尘。同为政党政治，而其间不同已如此。

中国传统哲学，民族特性，皆与欧、美不同。今日国家一般情势，与夫社会经济形态，亦复与彼诸邦未可一概相拟，然则必求中国强效英、美之先例，此亦何见其可者？强不可以为可，不仅无成效，抑且转生病害。

民初以来之政党成绩，当犹在国人之脑际。其时论政者有慨而倡为毁党造党之论者。何以蕲求毁党？此因当时的政党实在要不得。既主毁党，何以又主造党？则因国人心理，必谓民主政治之运用绝对需待于政党。不知民主政治可以为政党政治，而不必定为政党政治。今日何日，国步艰危极矣，

然尚有不可解之党争，有待于国人之高呼团结，则吾民德之不习于政党政治，其去民初岂甚相远。今纵使国内诸政党皆各降心相从，团结一致，然若只就政党立场，则其去真实民意，岂不犹甚远乎？况并此诸党之团结而不能。

然今日中国不能有好的政党政治，此不足为中国病，抹杀国情，一味效颦他邦之先例，即根本不足为好政制。中国人岂特不能步趋英、美，实亦不能步趋德、法或苏联。中国人实际利害观念不坚强，则不能效英、美；崇拜伟人之心理不狂烈，则不能效德国；严切组织克制异己之手段不深刻，则不能效苏联。一党专政既为群情所不安，而诸党互竞又为民德所不习，政党政治之在中国，其前途甚黯淡。然此并不足悲观，所足悲观者，乃在中国人不能自创一自适国情之政制，而必步趋他人之后尘，则其政治将永无独立自定之望。

所谓自适国情之政制者，大体言之，即所谓公忠不党之民主政治。“公忠不党”者，乃超派超党、无派无党，或虽有党派而党派活动在整个政制中不占重要地位之一种民主政治，亦即所谓“全民政治”。

三

今日问题所在，应问此种公忠不党之全民政治是否有创生之可能？若谓有之，其政制之大体结构又如何？

我请直率言我意：则此种政制在理论上，事实上皆已有

之。若言其大体之结构，则孙中山先生之“五权宪法”，即其理想之一型。我前已言，中国传统政治之最高理论与终极目标即为一种民主政治，而此种民主政治之所向往，即一种公忠不党或超派超党无派无党之民主政治。中山先生之五权宪法，本为融通中外而创设，故其精神所寄，亦自涵有公忠不党超派超党无派无党之精义，其所以为适切国情之点亦在此。此义甚深，国人言者尚鲜，请试申述之。

首当论中国传统政治之所向往，何以为一种公忠不党、超派超党、无派无党之民主政治？西方学者言政体，率分三类：

- 一、君主专制。
- 二、贵族政体。
- 三、民主政体。

中国自秦、汉以下，严格言之，早无贵族，中国传统政治之非贵族政治，此不待论矣。中国虽有君主，然固非君主专制，此如英伦虽至今有君主，然不害其为民主政体。中国传统政治，既非贵族政治，又非君主专制，则必为一种民主政体矣。然中国传统政治下乃无代表民意之国会，此则颇滋近人疑病。

然试一考西方政史，国会之起源，其时民权思想初现，政府乃为君主与贵族专擅之私物，与民众固无预，召集国会

即所以代表民意，即以此监督政府；政府则对国会诘访民众之同意。故西方政史当民权思想初现，其时则政府与民众为显然对敌之两体。所谓国会与民权者，则仅为一种监督与同意之权而已。其后民众势力日盛，政府乃始以国会中多数党组阁，由是则民众与政治渐合一，然国会中少数党则仍与多数党成敌对之势，此则所谓在朝党与在野党是也。故西方政制，乃至今未脱一种双方对立之形势。即“政民对立”之形势，俨若民众之与政府，宜处于敌对之地位然者。即上次欧战以后，意、德、苏联新改制创兴，亦以一党控制党外民众，其为两相敌对之形势犹存在。故西方国会初起，乃为一种间接民权，以其只代表民意监督政府，而政府本自与民众对立，民众只有监督行政之权，故可谓之“间接民权”。

若论中国传统政制，虽有一王室，有一最高元首为全国所拥戴，然政府则本由民众组成，自宰相以下，大小百官，本皆来自田间，既非王室宗亲，亦非特殊之贵族或军人阶级。政府既许民众参加，并由民众组织，则政府与民众固已融为一体，政府之意见即为民众之意见，更不必别有一代表民意之监督机关，此之谓“政民一体”，以政府与民众，理论上早属一体。故知中国传统政治，未尝无民权，而此种民权，则可谓之“直接民权”，以其直接操行政之权。

西方民权之初现，仅为间接之监督权，而中国传统民权，则为直接之行使权。故西方民众与政府对立，而中国传统观念，则民众与政府合一。若以中国传统政制无国会，便谓中